

西辽史綱

魏良弢 著

2481

西辽史纲

魏良弢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有和

2016/03

西 辽 史 纲

XILIAO SHIGANG

魏 良 弢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35,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2,000

ISBN7-01-000877-9/K·98 定价2.70元

前 言

1980年我在新疆大学历史系中亚史研究室工作时，开始接触西辽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料又做了进一步的收集，就西辽的纪年、疆域、政治史及其对中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经过修订补充，均收入《西辽史研究》一书。1985年我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工作。室、系、校的师长和领导为使能够继续深入研究西辽史，向美国王安研究院推荐，并承蒙该院批准，颁予1986年汉学研究奖助金。《西辽史纲》初稿写成后，一些师长和同志，特别是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编辑室的同志，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一并深表感谢。

这本《西辽史纲》是在《西辽史研究》的基础上写成。许多具体史实在《西辽史研究》中已做过考释，本书着重阐述西辽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力求勾出西辽社会、经济、文化的轮廓。但是限于史料和水平，恐难如愿，或有错误，敬请师长和同志指正。

本书引用之著作或文章，在注中只标出书名和页码或文章的题目，其版本或期刊的名称和期次详于本书之《文献目录》。外文著作和文章，为排印方便，在正文和注释中一般均将其名称译为汉文，其原文见本书之《文献目录》。

本书公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不再标明“公元”，如“1141年9月9日”。公元的世纪、年代，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一般也不再标明“公元”。如“12世纪40年代”。

中国王朝的帝王年号纪年，用汉文数字表示，为便于读者了

解帝王年号纪年或干支纪年的相对时间,用括号夹注公元年代,如“保大二年(1122年)”,“辛未(1211年)秋”。12~13世纪汉文史籍均用夏历,每年的开始比公历大致晚一个月左右,为避免繁琐,其月日一般不夹注公历月日,如“保大二年(1122年)五月二十八日”。本书《大事年表》,年代一律为公元;月日为阿拉伯数字者是公历,如“1141年9月9日”;月日为汉文数字者是夏历,如“1132年二月五日”。

伊斯兰历纪年(hijira 或 hegira 纪年,或称“回历”纪年),用汉文数字表示。伊斯兰历为纯太阴历,每年的开始与公历每年的开始没有相对固定的参比。因此,在伊斯兰历纪年之后一般均夹注公元年代,如“伊斯兰历六一〇年(1213—14年)”。这里的“1213—14年”表示伊斯兰历六一〇年在公元1213年和1214年期间。有时为考证某一事件,也明确表示为“伊斯兰历六一〇年(1213年5月23日至1214年5月12日)”。伊斯兰历的月名音译,如“萨法尔月”,不意译为“二月”。有时夹注伊斯兰历月份相当的公历月份,如“伊斯兰历五三七七年拉贾勃月(1143年1—2月)”。伊斯兰历的日用汉文数字表示,某些重大事件夹注公元年月日,如“伊斯兰历五三六年萨法尔月五日(1141年9月9日)”。

古地名,一般在正文中用括号夹注现今地名或方位,对其地望尚有争议者则另做注释。常见的音译术语仅用括号夹注其意思,但对一些生疏的音译术语则另做注解。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一 西辽的历史地位	1
二 西辽史研究情况	5
第一章 西辽王朝的创建	14
一 辽朝的衰亡	14
二 耶律大石的初期活动	20
三 可敦城称王时期	29
四 从西征到称帝	36
第二章 西辽帝国的建成	43
一 归并高昌回鹘王国	43
二 归并东部喀喇汗国	48
三 征服西部喀喇汗国	54
四 征服花拉子模国	58
五 西辽帝国的疆域	61
第三章 国家组织与基本政策	64
一 国家组织	64
二 基本政策	72
第四章 西辽帝国的中期和晚期	77
一 西辽王朝的中期	77
二 花拉子模的兴盛	81
三 桑贾尔起义与花拉子模灭亡西部喀喇汗王朝	85
四 高昌王国和葛逻禄部归附蒙古国	92
五 屈出律攫取西辽政权	95
第五章 社会经济	99

一	高昌王国社会经济情况	99
二	东西两喀喇汗国社会经济情况	103
	(一) 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	103
	(二) 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的农业情况	106
	(三) 伊克塔制度与土地所有制	107
	(四) 封建生产关系、地租和赋税	112
	(五) 手工业	113
	(六) 矿业与冶炼业	116
	(七) 商业与货币流通	117
	(八) 城市的发展	120
三	西辽王朝直辖领地的社会经济情况	122
	(一) 城市的发展	122
	(二) 农业	125
	(三) 畜牧业	126
	(四) 手工业与采矿冶炼业	127
	(五) 商业与货币流通	129
第六章	文化与宗教	131
一	文化	131
二	宗教	134
三	建筑艺术	138
附 录		145
附一	西辽王朝纪年表	146
附二	大事年表	147
附三	史料、文献目录	154
附四	西辽帝国略图	165

绪 论

一 西辽的历史地位

西辽王朝（1124～1211年），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刺契丹（Qara Khitay），在中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

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在大辽帝国覆亡之时，率部毅然西走，在亚洲内陆转战十余年，行程上万里，大败塞尔柱帝国，降高昌回鹘王国、东西两喀喇汗国、花拉子模国及乃蛮、康里、葛逻禄等部为附庸，建成西辽帝国。西辽王朝的疆域，东起土拉河，西包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面积不下四百万平方公里。在蒙古兴起前，西辽王朝称雄于中亚，左右形势近百年，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

我国中世纪的史学家认为西辽是辽的继续。元代官修的《辽史》把西辽的始末附于《天祚皇帝本纪》，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近现代的史学家也持同样见解。蔡美彪先生等编著的《中国通史》第六册指出，“西辽存在于我国西北约九十余年。正像南迁的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一样，西迁后的西辽也是辽朝的继续”^①，并把整个契丹族活动的一章明确标题为《辽朝的建立和政权的西迁》。陈述先生和邓锐龄先生也持这一见解^②。根据现有文字史料和考古资料来看，西辽王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辽朝在新的地理条件下——中亚——的继续，这不仅在种族和王统继承方面，而且在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也是如此。

① 《中国通史》，第六册，第91页。

② 分别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5页；邓锐龄为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写的《序》，第1页和第3页。

10世纪的穆斯林作家把整个世界分为四个地理区域——文化圈，即以长安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罗马文化圈，以报达（今巴格达）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圈和以曲女城（今卡瑙季）为中心的印度文化圈。汉文化圈包括突厥、吐蕃诸部族地面在内，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域^①。汉文化，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以汉族为代表的一种古老而又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在历史上，它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不断地扩大着其文化圈。

契丹族在北中国建立的辽朝（907~1125年），是一个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王朝，特别是自圣宗（983~1031年在位）以后，汉族的封建文化影响越来越广泛。“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又善吟诗作曲。后族萧合卓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充南面林牙（翰林）。”^②统治集团的重视和接受汉文化，与契丹国家的封建化过程相适应。这里所说的汉文化，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尚，即广义上的文化这一范畴。契丹贵族建国初期，为便于统治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生产类型的各族人民，创建了一套两部制的政府机构：“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③但是到了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年），北院枢密使萧孝忠想改变这种体制，上奏说：“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④事虽未行，但也说明这时境内各族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已有所改变，所以这位枢密使才提出此项建议。随着契丹国家封建化的加强，契丹人民的汉化程度也在加深，特别是上层人士。这从宋人洪皓的《松漠记闻》中可见一斑：

① 见伊斯塔里，《耶国道里志》（《阿拉伯地理丛书》，第一卷，第9页；

《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一辑，第15~16页）。

② 《中国通史》，第六册，第66页。

③ 《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

④ 《辽史》卷八一《萧孝忠传》。

大辽道宗朝（1055～1101年），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桀狄，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道宗皇帝自己认为契丹已是“文物彬彬”，同汉人没有什么两样，再不是“荡无礼法”的夷狄。

耶律大石更是一位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契丹贵族，考中进士，“擢翰林应奉”。根据辽朝的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说“状元”，方能授予这一荣耀职衔。大石生于辽朝末造，作为皇族，为匡扶大辽朝廷，尽上了一切努力。在五京俱失，天祚皇帝一意孤行的情况下，他奋然北走可敦城，转战至巴拉沙衮，都是为了“复大业，以光中兴”，即在物质基础具备之后，打回老家去，重建大辽帝国。因此，这个王朝以大辽的正统自居，典章制度除作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一仍先朝，始终未接受伊斯兰教，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在各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汉文化的特色^①。

西辽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把中亚地区建成为“光复旧物”的根据地，把当时最先进的汉文化推行到自己新建的国家。这时中亚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前期，汉文化的推行适应了这种总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西辽帝国的建立，结束了中亚各国内部纷争不已和各国之间相互侵袭的局面；大一统的出现，使社会秩序比其前其后的朝代都为安定。西辽王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对人民“轻徭薄赋”；对属国属部“柔远怀来”，“羁縻”、“安抚”；对宗教信仰，“循俗”，“宽容”。因此，当地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都有所缓和，形成了一种比较安宁、松宽的政治环境。所以穆斯林

① 《吉尔吉斯史》，第一卷，第142页。

史学家朱兹贾尼称耶律大石是“一位公正的君主”，受人民的尊敬^①。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说，他“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②。耶律大石西征，其队伍（包括大批汉人）也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带进中亚，当地人民赞叹：“桃花石诸事皆巧。”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者指出，“桃花石，谓汉人也”。

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西辽王朝统治时期是中亚社会经济普遍发展、城市生活高涨的时期，七河地区的许多城市和农业居民点正是在这一时期扩大，形成或出现。苏联50年代出版的《吉尔吉斯史》公正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新浪潮，归功于哈刺契丹。”^③

但是这个“万里威声震”的“名教”大国^④，为什么存在时间只有七八十年，并且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会土崩瓦解，消失于政治舞台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辽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低的，除封建王朝衰亡的表象原因——内部的腐败无能，国内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兴起和入侵——之外，深层的原因是，西辽作为一个帝国出现，而当时中亚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还没有提供这种物质基础，在帝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帝国中央同各地区的联系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地区间很少有横的联系。西辽王朝的征服，让原来的当地统治者作为附庸继续统治其领地，保存原有的生产方式，“满足于征收贡赋”^⑤。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和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在当时的条件下穿越极为困难。因此这些在绿洲上建立的国家，一般说来，经济上都是封闭的，民

① 《卫教者列传》，第二卷，第912页。

②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自注。

③ 《吉尔吉斯史》，第一卷，第142页。

④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二《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47页。

族成分上是单一的或者是由习俗相近的几个部族组成的；在思想意识上是排外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往往长达数百年，虽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其对外则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归降大国作为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在生产力或军事实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比如说，近代资本主义的水平，是很难打破中亚这种政治格局的。当时在中亚不论哪一块绿洲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所以中亚历史上没有出现统治时间上百年的、疆域横跨几个大绿洲，特别是葱岭两边的几个大绿洲的国家。即使外来征服者依据其本土雄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统一了中亚，如亚历山大·马其顿、唐朝和阿拉伯哈里发，也是很快就丧失了这一地区，它又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是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所决定，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及其封建的察合台汗国也逃脱不了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命运。

西辽王朝虽然也不能超越时代，逃脱历史命运规定的结局，但是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却做出了突出的业绩，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西辽王朝带给中亚人民的不是“毁耕为牧”和“夷城池为平地”这类愚昧和落后行为的灾难，而是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在中亚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太平盛世”。人民群众的怀念，考古出土的文物，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二 西辽史研究情况

(一)

关于西辽的史料，我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9期上已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订补后收进《西辽史研究》一书，同时还可参看本书末所附《文献目录》。这里着重谈谈西辽

史的研究情况。

我国学者对西辽史的编纂和研究较早。1344年元朝官方完成的《辽史》，在卷三十《天祚皇帝本纪》四附有一个1376字的“西辽始末”，这是我国史学家对西辽历史资料的第一次系统的整理和编纂。“始末”概括地记述了西辽王朝的整个政治史，包括王朝创建者耶律大石及其继承者的世系和统治时间、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活动，并保存一部分诏谕的原文。由于这个“始末”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已完全佚亡，从而它成为研究西辽王朝的基本史料。

“西辽始末”的原始材料来自何处，史无记载。脱脱等人编写《辽史》时，主要依据耶律俨的《实录》和陈大定的《辽史》。耶律俨的《实录》完成于天祚帝统治前期，不可能有关于西辽的记载。陈大定的《辽史》完成于1207年，也不可能有关乃蛮王屈出律取代西辽末帝直鲁古的记载。因此，“西辽始末”的基本史料应是蒙古军队占领巴拉沙衮时，从西辽王朝史官，更确切些说是从屈出律的史官那里直接取来的，正像他们从临安取走南宋史馆的资料、从中兴府取走西夏的文献、史籍一样。所以“始末”保存了耶律大石一些重要诏谕的原文、七州十八部的具体名称。所遗憾者，元朝修纂《辽史》诸公对之剪裁过多，拼缀又不缜密，致使“西辽始末”讹误、矛盾很多，为后人研究西辽史留下了许多困难。

元朝末年，我国学者开始推算西辽王朝的纪年。陈桱在其《通鉴续编》中第一次为西辽王朝编排了纪年^①。他把1125年，即耶律大石北走的第二年，定为耶律大石称帝建元延庆之年，然后根据《辽史》“西辽始末”各帝统治年数，推算其在位年代，西辽亡于1201年。陈桱推定的这个西辽王朝纪年，对后人影响很大。完成于1476年署名为商辂等编撰的明代官修《续资治通鉴纲

^① 此承黄时鉴先生指教，我在《西辽史研究》中误以为明代商辂等编撰的《续资治通鉴纲目》，首先对西辽王朝的纪年做了推算。

目》、1566年薛应旂编成的《宋元通鉴》以及王宗沐编写的《宋元资治通鉴》，关于西辽王朝的纪年均采用陈桎的推定。清初学者万斯同的《纪元汇考》基本上采用了陈桎的西辽王朝纪年，只是把感天太后、承天太后和夷列的改元年代提前了一年，即登基当年改元。以后，齐召南在1765年编成的《历代帝王表》，王之枢于1712年进呈、康熙皇帝“钦定”的《历代纪事年表》，直至罗振玉1925年的《重校订李氏纪元编》，关于西辽王朝的纪年也都采用了陈桎的推定。

事实上，《辽史》“西辽始末”所载年代有讹误。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早在二百年前就在《廿二史考异》“天祚帝纪”条中对所附“耶律大石事”（即我们所说的“西辽始末”）的年代提出质疑。以后，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八“西辽纪年”条中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门研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考据文章，纠正了陈桎、商辂等人关于西辽王朝纪年的错误。他推定耶律大石在位20年，西辽亡于1211年。以后，汪远孙于1822年又“推钱氏之意”，编为《西辽纪年表》^①。钱大昕的西辽王朝纪年，为后来发现的穆斯林史料证明是正确的。纪年问题，是治西辽史中一个繁杂而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一系列史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确定。

与钱大昕同时的厉鹗，在其编辑的《辽史拾遗》中对西辽史料也做了汇集，但他只收了《松漠纪闻》和《元史》、《圣武亲征录》三书的资料。稍后，杨复吉编辑《辽史拾遗补》，又补充了《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转录《庶斋老学丛谈》，当时《西游录》全文尚未从日本引回）、《西使记》、《隐居通义》以及《金史》等书中的有关条文。虽然仍不够全面，但其在西辽史料汇集方面做的开创性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① 钱大昕—汪远孙的《西辽纪年表》，厉鹗的《辽史拾遗》和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补编》均收入。

此后近百年间，我国对西辽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清末民初，地理学家丁谦（1843～1919年）才又写出几篇关于西辽史地的考释文章：《西辽立国本末考》、《西辽疆域考》和《西辽都城考》^①。这些文章有不少独到处，如指出耶律大石西走称王与起儿漫称帝建元，不是同一件事，也不在同一年，而《辽史》编纂者把它们混淆一起。但是他对西辽疆域的考定，并不完全正确；对西辽都城的考定，方位虽大致不错，然而其某些论证却不能成立。

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年）对西辽史地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考释工作。除《西辽都城考》外，他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圣武亲征录校注》和《古行记四种校录》等书中对西辽史实多所发明、补订。

唐长孺先生1936年在《国学论衡》第一卷第7、8两期连续发表《耶律大石年谱》，收集了许多中外史料，对西辽史上的一些难题做了考释。但是该年谱只写到1133年，似未完成。此前，唐先生还在《国学论衡》第一卷第6期上发表了《箭内互〈可敦城考〉驳议》一文。

（二）

西方国家研究西辽史，并把西辽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的是瑞典学者多桑（1780～1855年）。他在《蒙古史》第一卷第5章中用一半的篇幅阐述了西辽（哈刺契丹）的历史。多桑是一位通晓中亚多种语言的历史学家，充分利用了当时已发现的穆斯林史料，并把一些重要片断译成法文，作为该书的附录。同时他还利用了冯秉正译成西方语言的《续弘简录》和《续资治通鉴纲目》等汉文史料。所以多桑的《蒙古史》代表了当时西方国家研究蒙古史的最高水平，同样也是研究西辽史的最高水平。多桑作

^① 这三篇文章收入《蕙兰轩地理学丛书》（浙江图书馆刊印），以后又收入邓实编辑的《古学汇刊》第一集。

为一位卓越的史学家，对《续资治通鉴纲目》的西辽纪年提出疑问，根据《圣武亲征录》的有关记载，结合他当时掌握的穆斯林史料，指出西辽亡于伊斯兰历六〇八年（1211~1212年）。这同中国卓越的史学家钱大昕在其前做出的推断是一致的。但是多桑利用的穆斯林史料，在今天看来已是很不齐全，特别是他利用的汉文史料既非一手材料，而本身错讹又多。尽管如此，多桑的这部《蒙古史》不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是研究中亚史者，特别是研究蒙古史者必读的“教科书”，恐怕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如此。我国学者冯承钧在30年代把它译成汉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又予再版，对上下册的人名地名做了统一，并新增译名对照表。

但是，在西方世界真正使西辽史建立起来的还是俄国学者布萊特施奈德尔。他在1888年出版的《中世纪研究》一书中，首次把西辽史的核心材料——《辽史》卷三十的“西辽始末”以及《金史》中的有关材料译成西方世界通行的英文，使西方学者对西辽史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在此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应曾把这个“西辽始末”译成法文，刊登在1776年出版的《东方文库补遗》一书中，但未引起学者应有的注意。布萊特施奈德尔的《中世纪研究》同时还介绍了《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和《西使记》等重要行记，开阔了西方学者的视野。该书引用了有关西辽的若干穆斯林史料，如朱外尼（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拉施特）的《史集》、伊本·阿西尔的《全史》、加宾尼（嘉宾）的《蒙古行记》等，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比多桑《蒙古史》更多的穆斯林史料，同样也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所以我国学者梁园东在30年代把该书关于西辽的部分译成汉文，并详加注释，题为《西辽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史地小丛书”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在卷首增加译者的“新版自序”，卷末附录文章两篇：丁谦《西辽疆域考》和岑仲勉《读西辽史书所见》。在这里应着重指出，梁园东

先生的注释，对原文多所订正，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史学界对西辽史的研究。

岑仲勉先生在1935年在《金陵学报》第四卷第2期发表《读西辽史书所见》，对梁园东译注的《西辽史》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商榷和补正。此后，1941年《西北论衡》第九卷第8期发表了郅英的《读〈西辽史〉札记》。

西方学者马夸特在《科曼人》一文中，利用汉文史料和穆斯林史料对西辽王朝的纪年做了详细的考证，这篇文章收进他和邦克合编的1914年在柏林出版的《东部突厥方言研究》一书。他对西辽王朝纪年的推定，同钱大昕—汪远孙的《西辽纪年表》几乎完全一致，使西辽各帝在位年代基本上确定下来。

利用穆斯林史料研究西辽史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俄国学者巴尔托尔德。他的许多著作都涉及到西辽的历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学位论文《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这部巨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文”，即有关这一专著的原始材料，于1898年出版，第二部分是“论文”，于1900年出版。“论文”部分，1928年译为英文，经作者亲自校订，题为《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作为《吉布丛书》新辑第5种在伦敦出版。以后，1958年又出了米诺尔斯基校订的该书英文第2版。苏联科学院于1963年也出了该书“论文”部分的俄文第2版，列为9卷本《巴尔托尔德文集》的第一卷。1968年博斯沃思根据这个新的俄文版本，又出了英文第3版。从该书的一版再版，多次翻译校订，就可看出它的巨大科学价值。关于西辽的论述主要在该书题为《哈刺契丹和花拉子模》的第3章中。此外，他的《七河地区历史概要》、《突厥斯坦史》和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哈刺契丹”词条，以及关于中亚基督教的一些文章，都有关于西辽史的论述。这些论著均收入《巴尔托尔德文集》第二卷的上下两册中。《七河地区历史概要》、《突厥斯坦史》两书，米诺尔斯基译为英文，收入《中亚史研究四种》的第一册，在伦敦1956年出